

论西方政治信用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熊玲君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长沙, 410127)

摘要: 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 政治信用伦理被视为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价值, 是城邦国家特别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应遵循的主要德性与规范。在中世纪, 政治信用伦理与神学糅合在一起, 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政约——守信”关系, 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在文艺复兴时期, 出现了一股否定政治信用伦理的非道德主义思潮。但随着社会关系由“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随着以市场、民主与法治为基本内容的近现代文明的出现, 政治信用伦理在西方民主社会得到高扬, 成为西方民主政治运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根基。

关键词: 政治; 信用伦理; 政治信用伦理

中图分类号: B82 - 0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2-0157-05

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表明, 西方传统政治学与伦理学是内在不可分割的, 以诚实守信、恪守诺言、践履义务为核心内容的信用伦理更是传统政治学中不可或缺的价值要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把信用伦理看成是政治稳定的价值基础。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更是在坚持法治的前提下, 把信用伦理与政治结合起来, 推动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一、政治稳定的价值基础——西方早期的政治信用伦理思想

古代希腊的城邦是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 与原始的氏族组织不同, 城邦是政治社会, 其内部关系不是天然的血缘关系, 而是政治关系; 其政府与法律不是家族和民族的权威, 而是政治性的公共权威; 政治秩序和政治关系不是天然的, 而是人为的。这使人们对政治权力产生自己的期望和要求, 对它的服从也不是盲目的, 而是有条件的、理性的, 对政治问题的理性思考伴随着以城邦为核心的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综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思想, 我们不难发现, 在治国安邦之策略及其实现最佳途径上, 他们都把德性治国作为最优方案, 视德性为政治的基础。其中政治信用伦理就是城邦国家, 特别是统治者与臣民之间应遵循的主要德性与规范。

在柏拉图的《对话集》的“克力同篇”中, 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苏格拉底对个人与国家之间政治信用伦理理解的鲜明范例。苏格拉底被控告有罪入狱, 其友人克利陀劝告他逃出雅典, 以免一死。苏格拉底坚决拒绝, 认为既与雅典人订有无形之约, 就不能以法律对己不公为理由而违约逃跑, 他说, 如果逃跑, 雅典人必据理痛驳: “汝竟忘前言破坏法律, 背弃与吾等所缔结之公民生活之约, 其行径直荐贱奴之所为”, “汝岂非欲毁与吾等所结之约乎? 须知此约乃汝从容所自订者……倘汝对吾等果有不愜于怀, 或觉所订之约有失公允者, 则尽可自由离去”^{[1] (93)}。可见, 他认为, 70年来, 他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而去所愿去的地方, 并且一直享受着国家法律所带来的好处, 这事实上就是与他的国家订下了契约, 即情愿服从国家的法令, 承认国家与这里的人们合我的意, 也就是说, 与国家法律订下了甘做一个守法公民的协议。若此时违背法令而私自逃走, 那就意味着不守信约。在苏格拉底看来, 公民自愿在某一国家生活, 就意味着他自愿与他的国家和法律订下契约, 一个人就当始终如一地信守自己同意了的诺言, 而不能违背。这不仅是维护正义的价值前提(在苏格拉底看来, 正义就是守法践约), 同时也是保持国家稳定的重要伦理基础。

柏拉图虽然在其典籍中, 没有明确地谈到政治信用伦理, 然而, 我们不难发现,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

收稿日期: 2005-03-21

作者简介: 熊玲君(1971-), 女, 湖南临澧人, 湖南生物与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是以信用伦理的价值预设为前提的。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就当具备明智、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德性。其中正义的德性至关重要,它关乎城邦的秩序、各阶层的和睦和政局的稳定。而所谓正义,“就是监国者或统治者、辅助者或卫国者、谋生者这三个阶层的人各行其是而互不干涉。”^{[2](33)}而要保持三阶层之间的各行其是,各安其份,就预设着讲信用的伦理前提,也就是说,监国者、卫国者、谋生者三者之间,只有互相信任,相信各自能够做好其份内之事,才能不互相僭越。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分析了三阶层之间互不信任而相互僭越的后果,即必将导致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寡头政体的产生,可见,在柏拉图的理论中,隐含着信用伦理是城邦正义、政局稳定的伦理基础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国家自然论者,他认为人是政治动物,具有天然的社会性,因此,国家是人类天性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在国家起源上,他决不赞同契约论。但他认为国家建立后,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公共契约”。因此,讲究信用,特别是统治者尽力做到取信于民,对于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政体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分析了政体变革的原因,他认为,“发生变革的动机可分心理失衡,如私利和荣誉的不平、对惩罚的恐怖等;政事措施失当,如僭越、舞弊等;社会的变迁,如政治组织的失调等三大类。”^{[3](37)}在这里,他把统治者超越应有权限、舞弊、欺骗等对信用伦理规避的政事措施失当的因素,视为政体变革的三大原因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不管是寡头政体,还是贵族政体抑或共和政体,信用伦理的丧失是其政体倾覆的共同原因。他指出:“寡头政体的改变有两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一是执政者虐待平民群众,于是群众便乐于信从任何对抗执政的首领;二是执政团体间的自相倾轧。”^{[3](37)}这段话无疑指出了信用的丧失是寡头政体倾覆的显著根由。对统治者而言,前者是外部信用的丧失,即平民群众对执政者的信任丧失;后者是内部信用的丧失,即统治者内部失和,互相欺骗。“而使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倾覆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不能对组成城邦的各个要素作适当的调和”,特别是在“平民群众”和“寡头政要”之间由于缺乏调和而相互猜忌,产生隔阂,缺乏互信。“不义、恐怖和鄙薄常常为人民背叛其君主或僭主的原因。”^{[3](37)}为此,亚里士多德指出,保全有赖于采取温和谦恭的政策,概言之,“保护各种政体的一般方法有:防微杜渐;取信于民;官民和谐;警惕外敌;消除内讧;慎重名位;赏

罚有节;监视不逞之徒;预防社会失调;严禁官吏营私;力求各阶层互利。”^{[3](38)}总之,城邦长治久安的条件是:“执政人员效忠而才德,现行政体得到大多数公民的拥护,并能按照政体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3](38)}可见,讲求信用,取信于民,是维护、巩固政体的重要伦理基础。

二、政治信用伦理与神学的糅合——中世纪前期的政治信用伦理思想

中世纪前期(5世纪—15世纪),社会生活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是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组织基督教会控制的,哲学和社会伦理道德只是宗教神会的婢女。在这种情境中,政治信用伦理无疑也与宗教神学糅合在一起,其存在、发展的根由都内存于基督教神学之中。这种趋向集中体现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阿奎那从神性出发来讨论政治、权力、道德等问题,他认为,人类的统治权起源于神的统治权。因此,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所形成的“政约”,实质上是神的旨意。为此,任何一方违背“政约”,就是对神的旨意的背弃,因而是非义的。阿奎那认为,世俗政权虽是必要的,但它的必要只存在于这个政权能够维持正义,能给人们带来物质福利与精神幸福的范围内。国王的职责就是“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4](60)},而臣民则承担“服从统治”的义务,为此,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政约”关系。如果一个暴君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那就是咎由自取,因为他的臣民就不再受他们对他所作的誓约的拘束”^{[4](105)},也就是说,当统治者不谋求公共福利、履行职责,而招致臣民的不满,甚至起来反抗,推翻这种政治,那是咎由自取,合乎正义的。可见,在阿奎那看来遵守信用伦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承承诺言,一旦统治者违背诺言,失信于民,民众的失信(叛乱)行为,也无可非议。当然,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这种“政约——守信”关系是囿于神学范围之内的。“异教徒不信上帝,就理应丧失其支配那些已经成为神的儿子的基督教徒的权力”,而“当一个统治者由于背弃基督教而被宣判开除教籍时,他的臣民事实上就立刻摆脱了他的统治,解除那种使他们对他承担义务的忠诚誓言。”^{[3](71)}可见,在阿奎那看来,一切政治信用伦理道德规范都与神学教条糅合在一起并从属于它。

三、信用伦理与政治的分离—— 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弗利的 非政治信用伦理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弘扬“人性”的人文主义发展、传播、盛行开来,人们逐步突破了神学的束缚,从现实的角度来观察、审视一切问题。在政治领域,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表现得尤为如此。马基雅弗利首先改变了中世纪的神学观点,把政治问题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他突出强调政治主导作用,以政治行为的功利来判断道德的价值。他提出了应以“国家的利益”为政治和道德的唯一行为准则。为了国家利益,人们甚至必须随时准备把身上的美德变成相反的“恶德”,因为这些美德的价值绝不在它本身,而是在于它所涉及的功利。这样马基雅弗利从其目的决定论出发,将信用伦理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得出了政治无信用伦理的结论。他在其《君主论》中指出:“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方法是运用法律,而第二种方法是运用武力,第一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兽性行为。”^{[5](96)}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使用兽性行为 and 人类理性行为的斗争方法。”^{[5](96)}为此,他就“应当仿效狐狸和狮子”^{[5](96)},即像狐狸一样狡猾,善于欺骗与掩饰;像狮子一样凶猛,善于斗争与武力。“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5](96)}可见,在马基雅弗利看来,信用伦理是否丧失其存在的根据关键在于他所关涉的功利,一旦无功利可言,信用伦理就丧失了其存在的依据。这种从实用主义出发来判断道德价值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非道德主义或政治无道德论。

当然,这里所说的“非道德主义或政治无道德主义”并非是绝对的,马基雅弗利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信用伦理在政治领域的存在。他只是强调政治高于道德,政治不能受道德的束缚,道德也不应延伸到政治领域去干扰政治。政治是道德的前提,道德的完善有赖于政治的力量。当坚定信义有利时,便要遵守道德;当坚守信义无利,甚至有害时,便要抛弃道德。当然,抛弃道德并非是撕去温情的面纱,原形毕露,而是要善于掩饰这种“兽性”,“做一个出色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

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就像实际上就是如此”^[5](96)]。总之,君主“要懂得如何见风使舵,察言观色,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5](96)}由此可见,与其说马基雅弗利是一位“非道德主义者”,还不如说是一位“伪道德主义者”,他否认信用伦理在政治领域的存在,却又要以欺骗、伪善的方式来取信于人,是典型的道德伪学。

四、政治信用伦理的高扬——资本 主义民主政治社会运行的 道德基础

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的自由与平等的认识是所有倡导民主政治思想的认识起点,自由、平等是人类普遍的道德理性也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的终极前提。近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高扬自由、平等的民主社会。如何维护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成为资本主义政治伦理生活中的重要内容。17-18世纪的思想家们如斯宾诺莎、洛克、卢梭等,为了维护人们天赋权利,提出社会契约论的思想。他们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或者充满敌意或者存在缺陷,人们的天赋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于是,人们便订立一种社会契约,将一部分权利交给社会(国家和由此产生的政府)来保证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这种社会契约如何可能?他们提出了两条普遍性的伦理性法则。其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纽带——使人类能够作为人来相互交往——是忠诚,即一种承担彼此理解的职责和一种不断履行这种职责的美德。”^[6](98)]这条法则指出,人类需要并且依赖于他人的广泛合作,而相互承诺和相互理解则是促使社会合作成为可能的伦理性前提条件。在洛克、卢梭等人看来,政治是围绕人的天赋权利而展开形成的一种代理行为,是“个人、集体的合作性和策略性的互动,”因此,“信任的理性问题就是无可避免”,^[6](99)]即信任的道德理性在政治中必须占据着显要的位置,成为政治形成、发展的道德基础。人们通过权利的转让,使国家、政府获得了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依据是什么?为此,洛克提出了第二条普遍性法则,即“合法政治权力的特性是一种有根据的信任结构”^[6](99)]。在洛克看来,“所谓合法的政府权力,是指统治者代表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而行动的自由范围”,“在一个合法的政治社会中,政府只是在服务于其臣民时才被授予必需的自由裁决和强制权力。由此,在合法

政治社会中,政府权力实际上同时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设想为一种信任;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因此也有望成为一种信任、信心,即对明确、真实而悉心观察到的相互理解的取舍,一种理当接受的信任与合理和随意给予的信任之间的关系。”^{[6](101)}由此可见,政府合法权力的获得,本身就是相互信任的结果,其合法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取决于被统治者的信任及幅度。由此可见,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运行中,政治信用伦理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的民主历程时指出,地理、法制和民情是制约美国民主结构发生的三大因素,其中“民情”(即民众的习惯、思想、习俗和宗教精神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民情的支撑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7](358)}。日本前首相三木武夫在上任之初就日本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曾警告说,“除非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恢复人民对于政治的信心,否则,日本民主将会瓦解”^{[8](2)}。可见,公众的信任、信心对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性。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在其《社会体系》中指出:“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民主政治无疑需要政治信用伦理的价值支持。

第一,政治信用伦理是民主政治运行的价值前提。自由、平等是民主政治运行的逻辑前提。为此,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的自由与平等的认识是所有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家的认识规定,在洛克的思想学说中,是人的天赋的权利;在卢梭那里,则是契约社会里的公民平等;在康德的实践哲学中,便是意志自由。而当代美国学者达尔在论述现代政治的特点时也说:“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而,也必定会承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9](58)}由此可见,一个社会自由、平等道德理念的发达程度,对于民主政治的建立、运行是至关重要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的民主时指出,天主教教徒中的平等精神对美国民主政治的建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前面所言,信用伦理内蕴着人格平等、意志自由的道德精神,因此,政治信用伦理的弘扬,必将推动公民平等意识、参与政治权利意识、权利自主意识的普遍增强,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政治信用伦理是民主政治运行的价值根基。“民主政治就是大众参与的政治”(Politics by mass participation),这就意味着,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对公民的理性能力的起码信任基础之上的,即相信公民是理性的动物,能够把握、认清并实现自身的

利益,对周围的世界形成理性的判断,作出自己的选择,并因此承担责任。离开了这一信任基础,将公民视为“草民”、“愚民”、“上智下愚”,民主政治将无法真正建立起来。在现实生活中,大众参与政治,并非人人参与决策、管理,而是现实地选择选举代议制度来进行,即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议士,授权他们在该国的政府中代表自己参政议政,政府从选民的同意中获得正当的权力。这种代议制度体现了两种信任或信用关系:一是选民与代议士之间是一种信用(信任)关系。代议士是选民信任的体现,即选民相信代议士对自己绝对忠诚,能够在政府中表达自身意愿。同时也相信他的政治(业务)判断能力,相信他会替自己的长远利益打算。另一方面,代议士作为信任的结果,取得了选民的信任,就应该为选民服务,对选民负责。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承诺的兑现。二是在选民与代议制度的权力之间存在的一种信任或信用关系。约翰·邓恩指出民主社会中政府的合法权力“是指统治者代表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而行动的范围”,但“政府只是在服务于其臣民时才被授予必需的自由裁决权和强制权力”,由此,政府权力实际上同时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设想为一种信任;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因此也有望成为一种信任:信心,即对明确、真实的悉心观察到的相互理解的取舍,一种理当接受的信任与合理和随意给予的信任之间的关系^{[6](101)}。因此,政府的合法权力来源于选民(公众)的同意与信任,而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实现“信任期望”中才能被赋予。由此可见,民主政治是一系列“信用关系”的集合。只有信用意识得到增强,信用规则被普遍遵守,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建立和有序发展。

第三,政治信用伦理还是民主政治运行的价值保证。民主政治中,理想的代议政府应该是能够体现普遍民意的政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权利和利益都各不相同,这就使得通过选举这一形式来产生代议政府的实际结果变得扑朔迷离,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结果可能并不体现部分人的意愿和利益要求,然而,选举结果一旦成为事实,就必须得到全体公众的尊重和信任,这是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正如美国政治家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所认为的,“不确定性成为这么一种政体(指民主政体——引者注)的核心特征,不过这种不确定性在形式上只是相对的确定性。可能会有没有想到的个人或团体占据了统治地位,也可能新政权的路线与自己的不同,甚至

可能带来危害,要使公民能够忍受这一点,他们之间需要彼此相当程序的信任,而且这种信任还要有结构的保证^{[10](26)}。由此可见,尊重和信任民主结果是民主政治得到顺利运行的价值保证。

参考文献:

- [1] 柏拉图对话集六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 [2] 唐凯麟. 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3] 浦光祖. 从《理想国》到《代议制政府》西方政治名著释评[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 [4]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5] [意大利]马基雅弗利. 君主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6] 郑也夫. 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破坏[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 [7]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8] [日]绵贯让治. 民主的危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9] 达尔. 论民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0] [日]猪口孝. 变动中的民主[M]. 沈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redit ethics in the west

XIONG Lingjun

(Hunan Biological And Electromechanical Polytechnic College, Changsha 410127,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Greek city-state society, political credit ethics wa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values to maintain steady politics, and as the principal standards. In Middle Ages, political credit ethics was united with theology. It complied with the God to cre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or and the liege just like "political contract — faith". In the Renaissance, the immoral thoughts of generally denying political credit ethics appeared. But with society relation changed from status to contract, and with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cluding market, democracy and law, political credit ethics in the west democratic society became the basis of morality and value and that for good running of the west democratic politics.

Key words: political; credit ethics; political credit ethics

[编辑:颜关明]